

基督教节欲伦理研究

李学迎 赵化民

节欲对摆脱资源稀缺和人欲无限造成的“丛林世界”非常必要。基督教富有节欲伦理，主要包括节制物欲、禁食、独身、婚内守贞、节制统治欲等内容。在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物欲和性欲受到普世性节制，宗教力量则是践行节欲的典范，世俗权力的统治欲被教权和法律有效规约。基督教节欲伦理具有较高执行力，有助于化解有限之物与无限之欲的冲突，并助益了慈善事业发展。

关键词：基督教 节欲伦理 物欲 性欲 统治欲

作者 李学迎，1971年生，山东行政学院公务员制度研究所、山东省行政管理软科学研究所基地副教授；赵化民，1972年生，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地被另一个欲望所占领。”^①人的欲望无穷，追求最大化效用。而满足其欲望和效用的资源是有限和稀缺的，由此必然导致纷争甚至战乱。如荀子所言：“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②“然则从（纵）人之欲，则势不能容。”^③故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不会无节制地放纵所有欲望。“个人行为天生要使效用最大化，直到受到他们遇到的抑制为止。”^④“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⑤宗教伦理是传统社会节制欲望的重要规范。宗教节欲伦理一方面规定了欲望边界，要求人们践行克制和牺牲；另一方面，允诺人们在边界内尽其所能追求利益。由此化解有限之物与无限之欲的冲突。

基督教^⑥是西方主流传统文化，富有节欲伦理。基督教的一些节欲伦理具有鲜明禁欲^⑦特征。禁欲可视为严苛状态的节欲。中外古今之节欲或禁欲皆非限制人的所有欲望，因为“需要

① [美] 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编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卷首语、封底语。

② 《荀子·富国》。

③⑤ 《荀子·正名》。

④ [美]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健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⑥ 本研究中，中世纪基督教主指天主教，新教改革后指天主教和新教。

⑦ 禁欲主义（asceticism）是要求人们严格节制肉体欲望的一种道德理论。它源于古人忍受现世困苦的宗教教义和苦行仪式，是一种以抑制世俗欢愉为特点的生活，也称苦修（austerities）。其形容词（ascetic，禁欲的）来源于古希腊语“askesis”，意思是“练习”、“训练”。可见，禁欲最初与严格的训练形式有关。后来，则发展出抑制肉体欲望并追求智慧、情感与高洁精神生活的意思。

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①节欲或禁欲主指抑制人的肉体欲望,主要包括物欲和性欲,这些欲望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皆属最低层次需求,即生理需求。高级需要(如自我实现、奉献社会等)非但不应受限,反而应予以激励。节欲之欲多为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的欲望。此外,尚有大量完全负面性欲望,如淫乱,它们应被无条件禁止。除了节制物欲和性欲,基督教还特别强调要节制统治欲。基督教节欲伦理对西方传统基督教社会,乃至当今欧美,具有重要影响;形塑了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洞悉基督教节欲伦理,对我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基督教主要节欲伦理

基督教节欲伦理主要体现在对物欲、性欲、统治欲等的有力约束。它的节欲伦理大多属于禁欲。其禁欲表现为普世性的节制性欲和禁食等方面。力行苦修和独身的宗教力量(主要包括修士、修女和教士)尤为禁欲典范。

(一) 基督教之救贫济困和施舍捐赠

基督教并不反对追求和获取物质财富。《路加福音》中“主人交银给十仆”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旧约》也多处记载了上帝(即基督教唯一的神,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应诺为犹太人提供“流奶和蜜”的富庶之地。但基督教更强调施舍捐赠和救济贫弱,这正是节制物欲(主要在消费层面)的有力表征。奥古斯丁(本文指希波的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商业和借贷理论也不反对价值增殖本身,而是要求将增殖部分用于基本生活所必需,剩余则要用于捐赠和救济。

《旧约》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②“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③“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④“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⑤《旧约》还要求免除贫弱者的债务,“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⑥“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⑦

《新约》也主张节欲施舍。《路加福音》说:贫穷的人、饥饿的人、哀哭的人、被人恨的人有福了,神的国是穷人的;而富足的人、饱足的人、喜笑的人、被人称好的人则有祸了,喜笑的人要哀哭,饱足的人要挨饿。^⑧这与“登山宝训”的“八福论”表述相近。耶稣对想要永生的人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⑨耶稣还说:

① [美] 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编译,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② 《圣经·旧约·出埃及》22:21—25。

③ 《圣经·旧约·出埃及》23:10—11。

④ 《圣经·旧约·利未记》19:9—10。

⑤ 《圣经·旧约·利未记》19:13。

⑥ 《圣经·旧约·申命记》15:1—2。

⑦ 《圣经·旧约·申命记》15:9。

⑧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6:20—26。

⑨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9:21。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① 耶稣还告谕：不可将善事行在他人面前，故意叫人看见；施舍时，不可在人前吹号和有意去得人的荣耀，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否则，就不能得神的赏赐。^②

托马斯·阿奎那从自然法视角解释了为什么要救济贫弱。他认为，人法（如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应服从自然法，据神意所确立的自然法则，物质财富是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备；基于此理，任何多余的东西都应用于救济穷人；如果一个人面临迫在眉睫的物质匮乏，又无其他办法满足需要，他就可以公开或用偷窃的办法从他人财产中取得所需；严格来说，这不算欺骗或盗窃。^③

（二）基督教之禁食

施舍、祷告和禁食是普适于每个基督徒的圣事和责任。禁食是每个基督徒的重要日常生活内容，尽管不必每天如此。禁食不是指禁止吃某些动物^④，而是指信徒在灵修生活中为更好地默想、忏悔、祷告、洁净自己，暂时在一段时间（从一餐到几天）内不吃饭，藉此亲近神并得属灵经验的举动。普通的禁食可以喝水。据《圣经》所载，《旧约》核心人物摩西和《新约》核心人物耶稣都曾禁食。《旧约·申命记》说：摩西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版，即耶和华所立约的版；那时摩西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⑤《旧约·出埃及》也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⑥《新约》则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⑦除此之外，《圣经》还有多处关于禁食的教义。耶稣在教导禁食时，不说“如果你们禁食”，而说“你们禁食的时候”。这表明，基督徒的禁食不是假设，而是明确的诫命和必须的生活。当然，并非所有禁食都是40天。据基督教义，40天的禁食非一般教徒所可领受，保罗和十二使徒也没这么做，其需要神恩和启示。基督教绝大多数禁食不超过三日，且时间不固定。较固定的有规律可循的禁食包括两个，一是神所唯一规定的七月初十（犹太历）赎罪日禁食；再就是早期基督徒的周三和周五禁食。^⑧基督徒禁食一般基于下述目的：求神的能力，求神的帮助，求明白真理，认罪悔改，求神饶恕等。基督教要求在禁食时做到：不可故意叫人看出在禁食，不可求利，不可行恶；要向人行善，赈济贫穷；要专心祈祷，多做祷告；要停止娱乐消遣，不可同房等。《圣经》批评了不正确的禁食，说：“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⑨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9：23—24。

②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6：1—3。

③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宣读》，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2—143页。

④ 依据《圣经·旧约》：教徒不可吃血；地上的走兽可吃的是分蹄和反刍的动物，但是骆驼、獾子这一类的兽肉不能吃。不可吃死的兽肉。海里、河里的水生动物，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无翅无鳞的，死的都不能吃。鸟类中不能吃的有雕类、鹰类、乌鸦、鸵鸟、夜鹰、鱼鹰、鸮、鹭鸶、猫头鹰、隼、鹈鹕、秃鹰、鹞鸟、戴胜和蝙蝠。凡有翅、有足的爬行动物不能吃。地上的爬行动物如鼯鼠、硕鼠、老鼠、蜥蜴等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能吃。对于《圣经》关于禁食的上述规定，犹太人时至今日仍严格遵守，但基督徒较为自由。

⑤ 《圣经·旧约·申命记》9：9。

⑥ 《圣经·旧约·出埃及》34：28。

⑦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4：1—2。

⑧ 《十二使徒遗训》第八章。

⑨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58：3—7。

(三) 基督教之节制性欲

性欲是基督教重点节制的欲望,节制性欲是基督教禁欲最具代表性体现。从《旧约》到《新约》,从基督教诞生到国教地位确立,再到历时千年的中世纪天主教神权共和国,节制性欲经历了从讴歌爱情和严禁淫乱,到普世禁欲和宗教力量高度禁欲(如独身制度化)相结合的历程。

《箴言》和《雅歌》等《旧约》篇章不乏对爱情的讴歌。在《创世记》等篇章,上帝还多次赐福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同时,《旧约》和《新约》均明确主张严惩淫乱。“不可奸淫”是《圣经》十戒之一。《旧约》有许多对奸淫、淫合与猥亵等的具体界定及相应严厉惩罚,其中一例如“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他治死。”^①《新约》经典作家保罗也说:淫乱者、奸淫者、变童、亲男色者都不能承受神的国;^②人所犯的其他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而身子就是圣灵的殿。^③与《旧约》不同,《新约》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休妻,并提倡独身。耶稣说:夫妻是神配合的,乃是一体,人不可分开;凡休妻另娶的,若非淫乱之故,就犯了奸淫;娶那被休妇女的人也犯了奸淫。^④保罗提倡独身,但认为婚姻是避免淫乱的次优选择(耶稣也有类似表述,奥古斯丁等其他基督教经典作家也多持该观点),是有助于避免大罪的小罪,婚姻和独身都是神的恩赐。保罗说:为避免淫乱,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夫妻不可彼此亏负,暂时分房要两相情愿,为的是要专心祷告;尚未嫁娶者和寡妇若乐意独身,是很好的;但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嫁娶;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⑤娶妻并非犯罪,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但希望人们免受这等肉身苦难。^⑥耶稣也说,为实现禁欲而“不嫁娶”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

基督教还主张力戒思想淫乱,认为肉体被玷污并不影响内在贞洁,被玷污者更不应自杀。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⑦奥古斯丁则论证:别人的情欲不可能使一个人失去贞操,因为贞洁是一种内心品德;只要被强奸者内心保持贞洁,就不能认为她因遭强奸而失去贞操;别人无论对肉体做什么,都不是承受者的错;相反,如果内心没有贞洁的品德,把性交看成一种肉欲,即使未被强奸,实际已失去贞操,肉身的圣洁也就失去了;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自杀,高尚绝不能用来促进自杀,无辜受辱妇女更不应自杀,“如果法律不允许私自杀人,哪怕是杀一名罪人,那么杀死自己也犯了杀人罪,他杀死自己的罪行比杀死别人更重,因为他杀死了一名无罪之人。”^⑧

普世禁欲和独身制度化。独身一度被视为仅次于殉道的称义之举。有早期教父宣称,即使拥有最美满婚姻且没有婚外性行为的教徒,其在天堂的地位也远低于独身者。有的教父视婚姻为“下贱的状态”、“淫欲的手段”,主张“用童贞的斧头去砍伐婚姻的森林”;有的教父说:“婚姻是人类弱点的延续”;有的教父说:“那些对自己的妻子爱得过于热烈的人,就是一个通奸者。”自三世纪圣安东尼始,基督教社会修道士千年不绝,中世纪时规模庞大。中世纪修道院明确规定修士和修女独身,不可拥有私人财产,要立誓恪守基本义务:安贫、守贞和服从,努力抵制三大世俗诱惑:财富、性欲和野心。绝大多数修士和修女能严格履行独身禁欲生活,秉持“绝财、

① 《圣经·旧约·出埃及》22: 19。

②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6: 9—10。

③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6: 18—19。

④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9: 4—9。

⑤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7: 2—9。

⑥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7: 28。

⑦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5: 28。

⑧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8页。

绝色、绝意、守恒”四愿，是全社会禁欲典范，他们还曾多次修正教士群体过于世俗化的错误。教士群体也是禁欲典范。早在386年，罗马教皇就发布命令：禁止已婚者当教士；已担任副祭司以上教职的已婚者，被禁止与妻子性交。十一、十二世纪，天主教开始强制全部教士独身。教皇还曾多次与民众以及世俗君王贵族联手反对教职人员偷情、违规结婚等。直到今天，天主教仍严格要求高级教士独身。至少在中世纪，由教士和修士修女两大群体构成的宗教力量实现了独身制度化。不过，历史上，还是有不少教士以多种理由和方式结婚，也发生过教皇偷情等腐败行为。但这在整个独身史中占比不大，且存在可修正这些行为的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新教尽管同意修士修女、教士结婚，但仍要求所有教徒节制性欲，甚至比天主教更严格反对非生育目的性行为。对于婚姻，天主教长期坚持一夫一妻制，严格限制离婚，君王贵族也非例外；还要求夫妻性生活必须采用男上女下、面对面的传教士体位，其他性交姿势则是必须忏悔的罪恶；非受孕目的的性生活最好一次也没有，非婚性生活更受严惩。1181年，婚姻被列为圣礼，要求遵循三大原则：自由意志、节欲和族外婚；新娘和新郎必须表示同意并向对方许下至死忠贞不渝的誓言，婚姻才生效。由于每周宗教纪念日（如纪念耶稣周四被捕和周五受难）均需禁欲，已婚基督徒每周只有周二和周三两天可以性交。这两天还要再除去宗教节假日和不宜受孕日期。据推算，全年平教徒夫妻可以性交的日子只有42天左右；而恪守婚内禁欲生活的平教徒夫妻，实际性生活日要低于42天。此外，孕产期和哺乳期还均禁止性生活。婚内禁欲和严惩非婚性生活使基督教社会实现了普世性禁欲。历史上，还发生过基督徒追求更极端的性禁欲，即自宫，但此举被教廷定为异端行为。

（四）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论节制统治欲

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是后《圣经》时代最重要两位基督教经典作家。奥古斯丁是教父学说集大成者，是基督教主流教义奠基人。托马斯·阿奎那是基督教神学集大成者。他们均有丰富的神权政治思想，均看到了节制统治欲的重要性。

奥古斯丁论述了统治欲的性质和何为合理的政治统治。在奥古斯丁看来，在人的各种欲望中，最强的是性欲，而统治欲则是理性、意志、情感以及灵魂自由的主要奴役者。^① 地上之城的典型特征是缺乏对他人的爱和关怀，贪求凌驾于他人的统治权，该隐做恶并妒忌亚伯，正源于最卑劣的欲望——对同胞的统治欲；统治欲邪恶之处在于，人企图仿效上帝，做神灵凌驾于同胞之上。^② 基于上帝的创造，人最初就其深刻本质而言是“社会性的动物”，而非“政治的动物”，不适于生存在他人统治之下；强制性社会权力表现为统治和征服欲，不可能没有不平等、强制和暴力，但就其起源而言，与上帝创造的本善自然无关；尽管如此，上帝还是依其天意而用恶为善；在此意义上，一种社会权力结构只要能在被罪污染的人类生活中维持某种秩序，还是可作为罪的一种补救；统治欲既是罪，也是对罪的惩罚。^③ 没有什么政治秩序是绝对的或神授的；所有的政治秩序和组织都是动态的、可变的。^④ 基督徒皇帝的幸福，不在于统治了很长时间，或安宁地逝世并把皇位传给儿子，或能够征服国家的敌人，或能挫败国内反叛企图，或在可悲的一生中得到其他安慰；而在于公义地进行统治，不陶醉在高贵荣誉和高度赞扬中，不接受谄媚和奉承；在于把皇权当作对上帝的侍奉，敬畏、热爱、崇拜上帝；在于慎用惩罚，多用宽恕，不用惩罚来进行私人报复，多用仁慈来弥补被迫实行的严峻手段；在于拒斥奢侈，不追求有悖于永福和皈依

① [芬] 罗明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生活神学》，张晓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同上，第120—121页。

③ 同上，第127—130页。

④ 同上，第178页。

上帝的荣耀；在于不拒绝向上帝，奉献人道的献祭、忏悔和祈祷。^①

虽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天然要过政治生活^②，这与奥古斯丁观点相左。但阿奎那同样主张严格节制世俗权威的统治欲，总体上秉承并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思想。阿奎那节制统治欲的思想重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要求世俗权威服从神权与公义的代表，即教权；二是要求世俗权威严格守法，并充分尊重公众意见。阿奎那认为，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权力，因为前者直接源于上帝，这可在《圣经》里找到理论根据；世俗权威有存在的理由，但它必须适应教阶制社会，并承认自己居次要地位。^③“正义的正常状态要求臣民服从他们的上级，否则在人类的事务中就不会有稳定的局面。”^④但政治义务要以宗教义务为依归。^⑤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君王都应当服从教皇，就像服从耶稣基督本人一样。^⑥“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肉体之服从灵魂。”^⑦“当一个统治者由于背弃基督教而被宣判开除教籍时，他的臣民事实上就立刻摆脱他的统治，解除那种使他们对他承担义务的忠诚誓言。”^⑧“统治者的命令不应超过人们所授予的权力，也不应强使臣民承受无益的或不平均的负担。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服从是以权力的正当行施为条件的。不法的命令没有拘束力。昏君必须加以反抗。”^⑨“克服暴政弊害的办法应以公众的意见为准，而不能以若干个人的私见为断。”^⑩“天堂的最高幸福是人君的酬报”^⑪，“国王的职责就在于殚心竭虑地增进公共福利”。^⑫无论何人，如果为他人制定法律，就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全部法律都应以人们的公共福利为目标，并且仅仅由于这个缘故才获得效力，否则就没有责成人们担负义务的力量。^⑬无论谁，只要依仗暴力据有权力，就不是真正的领袖；如果掌权者的命令违背了那个权威在当初被设立时所抱定的目的，人们不仅没有服从的义务，而且还不得予以反抗，正如宁死而不屈从暴君的神圣殉道者那样；如果掌权人的命令越出自身权限，臣民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⑭

三、基督教节欲伦理主要特点

前面主要从应然层面分析了节欲伦理的主要内容。本部分将分析基督教节欲伦理的初始布道路径和践行路径、社会上层群体节制物欲和性欲的状况、世俗权力统治欲的节制状况、节欲伦理的激励机制和执行力等，以实然层面为主揭示基督教节欲伦理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初始布道路径和践行路径由下而上

节欲伦理是基督教义的内在组成部分，基督教义的初始布道对象也即节欲伦理的初始布道对

① [古罗马]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卷），第 227—228 页。

②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宣读》，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4 页。

③ 同上，第 21 页。

④ 同上，第 148 页。

⑤ 同上，第 26 页。

⑥ 同上，第 85 页。

⑦ 同上，第 140 页。

⑧ 同上，第 27 页。

⑨ 同上，第 35 页。

⑩ 同上，第 59 页。

⑪ 同上，第 69 页。

⑫ 同上，第 70 页。

⑬ 同上，第 123 页。

⑭ 同上，第 151 页。

象。基督教节欲伦理的布道路径由下而上。基督教首先在中下层群众中传播,创始人耶稣的直接信徒主要是穷人。在国教地位确立前,由于基督教教义严重冲击了世俗权威和欧洲传统宗教,基督徒不断受到迫害。耶稣、保罗、多位使徒与知名教父以及大量平教徒由此殉道。许多教徒毅然放弃生命,尽管有时求生条件只是向罗马皇帝鞠个躬或宣称放弃信仰基督即可。基于殉道精神的感召力、富有成效的传教活动、教义的合理性(尤其是关爱弱者)等,生活困苦的下层人首先大量皈依基督,基督教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部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中上阶层包括王庭也最终选择了皈依。以下层人为主的早期基督徒一般过着严守律法的禁欲式清苦生活,反对骄奢淫逸;每日3次诵读《主祷文》,每礼拜三和礼拜五为禁食日,主张“禁食比祈祷好,但施舍比两样都好”。^①不仅禁食由下层人发起,节制性欲亦如此。基督教独身主义最初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从公元3世纪开始,在埃及和叙利亚基督徒中,首先刮起了一股以离家修道为特色的禁欲主义风,并很快蔓延到整个西欧。^②天主教规定所有教职人员必须禁欲独身则在其后。据中世纪天主教规定,君王贵族也必须履行一夫一妻制、婚内节欲和杜绝婚外性行为的义务。

(二) 对上层群体的物欲与性欲约束有力

自我实现和奉献社会等是马斯洛话语体系中的高层次需要,其正外部性强,是团契社会的纽带,是道德高尚的体现。在任何社会,高层次需求非但不会被禁止,反而会被大力提倡。物欲与性欲等低层次需求因资源稀缺性和竞争性问题,在任何社会均必须确立限度并予以节制。

中世纪基督教会曾经把宗教力量(包括教士群体和修士修女群体,教皇、红衣主教等属于教士群体)称为上层的属灵阶层(但被新教否定,路德说所有教徒都属灵。当前基督徒普遍秉持路德的观点),其他则属于下层群体,后者包括以君王为核心的世俗统治力量。但从世俗层面看,君王和世俗贵族也无疑是上层群体。本文把宗教力量和世俗君王贵族共同视为传统基督教社会的上层群体。一个社会的资源常集中在上层群体手中,基督教社会亦不例外。但基督教节欲伦理有力约束了上层群体对资源的消费。多数宗教文明中的上层群体,尤其是世俗君王贵族,常常占据和消费太多资源。而如果他们占据和消费过多资源,势必降低整个社会的总体效用。从福利经济学视角看,把一个饼子分给无饼可食的饥饿者,相比把它分给已吃了两个饼子的人,会增加社会的总体效用和福利。基督教节欲伦理有力地约束了上层群体的物欲和性欲,上层群体在消费层面享用资源相对较少,由此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

基督教强调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世俗地位高的阶层和群体没有被赋予享用较多资源的权利。无论《旧约》和《新约》,还是后《圣经》经典作家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等,无不强调对穷人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和关爱。无论拥有多少财富,无论是否被鼓励去追求财富,任何人都从未被许诺奢侈,都被要求严格控制消费欲望,都被鼓励捐赠。新教与原始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不同只是更鲜明地鼓励教徒去创造和积累财富。基督教社会上层群体,占有较少资源。宗教力量是节制欲望的典范。不仅基督教经典作家耶稣、保罗、众使徒、奥古斯丁、阿奎那等身体力行,高度禁欲;而且教士、修士、修女也是禁欲典范,尤其在性欲方面。早在中世纪之前,教会就致力于教士独身,并在中世纪时,成功实现了教士独身制度化。教会尽管有大量物质财富,但不许遗传给教士亲属,教会用物质资源办了育婴堂、教会医院等大量公益事业。尽管也有教士阶层偷情的腐败行为,但比例不大,且多得到修正。同普通基督教民众一样,君王贵族需恪守禁食、节制性欲的规定。君王也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而且离婚尚需教皇批准。基督教有效地节制了上层群体的物欲和性欲,这也为救济贫弱奠定了基础。基督教社会的性禁欲在较大程度上为自愿选择,是意志力和灵性高的体现,是称义和亲近上帝的表现。实质上,基督教禁食和性禁欲均

① 任继愈主编《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② 林中泽:《中世纪西欧的宗教禁欲主义及其历史影响》,《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第62页。

将遏制低级需要与实现高级需要联系在了一起,即成功遏制低级需要代表了实现高级需要。

(三) 有力规约了世俗统治

节制物欲和性欲是基督教和其他诸宗教文明的共同特点。但相比而言,基督教用教权和法律更有成效地规约了统治欲,在一定程度上把世俗权力关进了笼子。与儒教相比,即是如此。不可否认,儒教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和等思想,尤其仁政思想,对以君王为核心的世俗权威会有一定约束力。基督教的信、望、爱、从等核心伦理也对世俗权威具有相似功能。但与儒教不同,基督教明确强调了统治欲的负面性和世俗统治的服务性,并给予其有力制约。

在《新约》中,耶稣就曾告谕:基督徒首领是要服侍人。^①而且说:圣子的到来,不是要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舍命为人赎罪。^②奥古斯丁则称统治欲为最卑鄙的欲望,因其使人欲凌驾于自己的同胞之上。他认为,基于上帝的创造,人最初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性动物,而非政治动物,不适于生存在他人统治之下,基督徒皇帝必须服从神和神谕。阿奎那虽认为人天然要过政治生活,但也同样认识到世俗统治是一种必要的恶,并明确主张限制世俗权威的统治欲。一是要求世俗权威服从神权和教权;二是要求世俗权威服从体现民众意志的法律。儒教没有视统治欲本身为卑鄙或者不良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儒教社会的君王可称“天子”,君王旨意高于成文法律(由于未充分体现民意,其法律属于西方先贤话语中的恶法。西方先贤认为恶法非法,民众没有服从恶法的义务),甚至长官意志也高于法律,旨意和长官意志高于恶法一般是进一步扭曲了正义。

历史上,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曾存在教俗之争,也有的学者称之为神权(或教权)与君权(或王权)之争。实际上,这些事件中的君王从未否定神权,他们只是否定“教权为神权的代表”,不想服从教廷和教皇领导,并争夺对地方教职人员的任命权和地方教会资源的控制权。基督教社会君王常自称服侍神及神的子民的“仆人”,此举鲜有例外。由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基督教经典作家的思想被认为是神的启示,所以基于对神权的敬畏,基督徒皇帝或贵族不仅不会否定《圣经》,而且还会把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的思想奉为主臬,会较好地遵守其中诫命。

律法是《圣经》的重要内容,其中,《旧约》摩西五经通常被称为律法书;《新约》诸多教义也具有律法性质。阿奎那将法分为永恒法、神法、自然法和人法。永恒法是神(即上帝)关于整个宇宙运行的法则。自然法是永恒法中适用于人类社会的那一部分。神法则是神谕示于人的法则(因人理性有限而不能靠自身充分洞悉这些法则,故神将其谕示于人),主要是《圣经》中的律法,属成文法。他强调人法(世俗成文法,主要是世俗权威制定的法律)要服从永恒法、神法和自然法,而且人法的制定还要充分尊重民意。他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视为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强调全部法律(人法)都应应以人们的公共福利为目标,任何人(主要强调君王)都必须遵守自己为他人所制定的法律。基督教将不能体现公众意志的法定性为恶法,认为人们没有服从恶法的义务。在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教会法庭(不同于宗教裁判所)还与世俗法庭长期并存,教会法庭秉持教会以爱正错的理念,并对基督教社会诸多事务拥有最终裁决权。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法律均对世俗权威形成了有力约束。自然法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和根基,基督教自然法思想则是近现代自然法的重要理论源泉。孟德斯鸠说:自由就是充分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卢梭说:自由就是所有人遵守共同的法律;洛克说:法律并非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障和扩大自由,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哈耶克说:自由就是服从且仅服从法律。自由的主要障碍就是世俗权力僭越法律,因此,基督教世俗权力基于法律规约而节制统治欲,这为自由奠定了基石。

相比世俗权力,中世纪教会力量的优势在于:掌握整个社会所必需的基督教义的诠释权;掌

①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2:24—27;《圣经·新约·马可福音》9:3。

② 《圣经·新约·马可福音》10:45。

控覆盖整个西部欧洲的教会分支（有的大城市有数百教堂，教堂是城乡生活的中心）和修道院所；可提供普世性宗教服务和爱意关怀；是践行基督教义的典范（此即道德优势），比如在节制物欲和性欲方面；拥有对基督徒参与教会生活的决定权，例如，绝罚（即逐出教会，革除教徒教籍，属于非常严厉的惩罚）就是教会曾经悬在世俗君王头上的利剑，世俗君王多次屈从教会的绝罚威胁；拥有一支庞大而代不乏人的优秀理论队伍，掌握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中世纪天主教为提升教义，曾有“魔鬼代言人”制度，即鼓励在经院内对教义进行正反方论辩；倘若反方无人，就力所能及地安排最优秀的理论家代表反方，代表反方的理论家被称为魔鬼代言人。

此外，相比世俗权力，中世纪天主教还有更重大优势。此即可从《圣经》中找到教权高于世俗权力的依据，亦即耶稣所言：“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①并告诉彼得（被奉为首任教皇）：“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②耶稣之言属于神性告谕，对世俗权力有较大威慑。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基督教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也具有神性，也将世俗权力置于教会权力之下。

相比教会力量，世俗权力的最大优势在于掌握着暴力机器，尤其是军队。他们也曾尝试在理论上挑战教会权威，但实践层面和暴力层面的挑战远比理论上的挑战更为成功。教会缺乏可直接抗衡世俗力量的暴力机器（但常借力打力），但掌握了基督徒视之为命的精神食粮（还掌控大量物质财富，并一度掌握西欧三分之一以上的地产），并靠其缔造了面积大于中世纪西欧任何世俗国家的神权共和国。阿维尼翁之囚和卡诺莎之辱是教俗之争的典型案列。在前者，教权屈从于君权；在后者，君王则在教皇面前悔改。可以说教权与君权在权力之争上互有胜负，一方面，君王需要教皇或教皇代表为自己加冕，从而获得全社会认可，并在宗教生活方面接受教会领导；另一方面，也有的教皇并不是由红衣主教等选任，而是由世俗皇帝确立。

总的来看，中世纪中后期的现实是，教权长期高于君权，这表现在政治、经济与信仰生活等诸多方面。中世纪君王离婚尚需教皇批准。英王亨利二世（英国宪政奠基人之一，被奉为英国乃至欧洲法律之父）晚年与妻子隔阂较大，曾秘密请求教皇准予离婚，得不到批准以致郁郁而终。英王亨利八世因无儿子，想离婚另娶，未被教皇批准，转而与教皇反目。本来积极协助天主教打压新教，转而大力推进宗教改革，成为继路德、加尔文之后，又一重要新教领袖。

基督教通过教权和法律将以君权为核心的世俗权力关进了笼子，实现了对人权与自由的初步呵护。世俗力量也曾多次成功纠正教权的过误与腐败。由此，教权也一定程度上被关进了笼子。

（四）节欲伦理执行力较高

梁启超曾说：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应如是，无术使之必如是。^③此言道出应然与实然、文本规范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差距问题。执行力是伦理规范的生命所在，是应然与实然的桥梁，激励机制则是执行力的核心要件。如果缺乏有效激励，再美妙的伦理规范也会被束之高阁。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任何宗教伦理的落实执行都至为关键。激励既可以是世俗的，也可以是超世俗的，抑或兼而有之。本部分从经典文献的权威性、经典文献语言简易性、现实中宗教力量的以身垂范、是否存在具有“完全信息、无限期重复博弈和公正的奖惩”特点的约束机制等方面，分析基督教节欲伦理的执行力。

经典文献的语言是否简明、内容是否具体，关乎教徒能否高质量地掌握节欲知识和信息，也是判断节欲伦理的执行力要素。《圣经》是基督教核心经典，其语言简明易懂，为普通人所可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6：18。

②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6：19。

③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第142页。

领会,只要识字就能看懂(字面意义),只要不聋就易听懂,且内容具体。《上帝之城》等经典也具有相似特点。这便于节欲伦理的信息充分传递到平教徒,有利于其落实执行。也有利于平教徒监督上层精英的节欲状况,减少了教会力量通过垄断教义寻租的空间。天主教会一度垄断教义宣讲,平教徒须到少数场合才能读到《圣经》,使大部分教徒失去了直接亲近《圣经》,并直接获取其中节欲知识信息的机会。新教改革扭转了这一局面。路德主张每个教徒都是祭司(即人神之间无需教会作中介),都可得到一本《圣经》,都可读讲《圣经》。路德还将圣经译为德文,方便了德国人的精神需求。

经典文献权威性高,其应然层面激励措施的可信性也高,其伦理规范的执行力就高。由于《圣经》具有至高权威,为基督徒所笃信,所以基督教也被称为“一本书的宗教”。《旧约》主要是神的律法,《新约》则主要是神的救恩。历史上,无论教俗之争中的世俗权威,还是宗教改革后数以百计的新教流派,它们挑战教皇和教廷权威,但却从未挑战神权和《圣经》的权威性。甚至被天主教定性为异端的(新教之外的)诸多派别也是如此。由基督教经典文献可知,在应然规范层面上,不遵守教规教义的教徒总要受严厉惩罚;而严格践行教规教义者总得要得丰厚奖励,节欲伦理则正是教规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圣经》可知,未严格按照应然标准践履教规教义者所受惩罚包括:受疾病折磨、被杀死、入地狱受永刑、被野兽吃掉、亲属与代际受刑(尽管上帝要求教徒不可因父杀子、因子杀父,但他自己声称要追究违规者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等,且言辞灼灼。每有重要教规教义,总附以此类戒语。同时,严格践行教规教义者所得奖励也相当丰厚,奖励包括:富庶的土地、远离疾病、享永福等。《圣经》的权威性保障了这些应然层面的激励措施的可信性,有助于保障节欲伦理的执行力。

此外,基督教信仰使教徒的行为具有双重交易和双重博弈性质,一是世俗交易和博弈;二是与上帝的交易和博弈。所获得的激励也是双重的,一是世俗社会的回报;二是上帝的奖赏。基督教尤其强调来自上帝的酬赏,世俗社会的回报在基督徒效用函数中不占重要地位。上帝的酬赏又包括两方面,一是可在世间得到的;二是可在天国得到的。这其中,基督教又强化了可在天国得到的酬赏,亦即没有任何疾病和痛苦的永福。永福是基督徒心中的最重要激励。然则天国的激励是远期的肉身死后的激励,对众多教徒来说是超验的,是今生不可直接经验证明的,这意味着会降低教规教义的执行力。基督教对此有弥补措施,一是提供圣徒体验上帝和天国生活的描述;再就是宣扬耶稣、保罗、许多知名教父、以及平教徒等的殉道精神等。尤其后者具有强大影响力,它是许多教徒亲身经验过的,甚至许多异教徒目睹殉道场景后选择了皈依基督。在他们看来,若无上帝和天国永福,就无法解释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还要为害他的人祝福;就无法解释诸多知名教父、平教徒等,面对诸如只要鞠个躬或声言不再信基督这么容易的求生条件,却毅然选择了痛苦的死亡。基督教经典作家耶稣、保罗、彼得、奥古斯丁等人以身垂范,严格践行基督教义并且不惜为此殉道,这是基督教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并铸就了平教徒的坚定信仰,也提高了节欲伦理规范的执行力。

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是基督徒的两条基本信仰。这两条信仰将基督徒的节欲行为置于“完全信息”、“无限期重复博弈”和“公正的奖惩”三个约束条件之下(据博弈论,这三个条件可确保规范得到落实。同于此理,康德认为,道德行为要真正落实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上帝存在,二是灵魂不死)。灵魂不死使教徒的节欲行为具有无限期重复博弈的特点,上帝对其每一期行为总握有修正机会。上帝的全能全知说明他能掌握教徒的完全信息,教徒深信上帝可获得关于他们节欲行为的所有信息。上帝满怀仁慈并绝对公正,断不以义者为不义、以不义者为义,义人将获得丰厚收益,进入天国享永福,践行节欲则是称义的要件之一。无论以前践行过多少节欲行为,如果当下不践行,将来都可能面临地狱的永罚。践行节欲的边际收益永远大于零,且远远大于零。这三个约束条件降低了基督徒践行节欲的机会成本,有助于保障节欲伦理的执行力。

（五）助益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

救济贫弱是基督教重要教义，践行慈善是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任何有条件的个人和组织的宗教义务。施舍和禁食普适于所有基督徒，高层教职人员和世俗君王也不例外。基督教主张一夫一妻制和婚内节欲；对君王而言，这杜绝了嫔妃现象（个别有姘头，但广受谴责），也大大减少子女数量，进而减少了宫廷消费。同理，基督徒贵族与官吏的家庭消费也较低。此外，相比传统儒教社会，基督教社会的丧葬更节省了巨额财富。即便基督徒皇帝去世，也不埋随葬品（但常在墓穴上方有真人大小的自身雕像。据基督教义，埋随葬品非但无益，反而有害），而且占地很少，很多占地不超10平米。有的一个家庭仅占20平米左右。传统儒教社会则丧葬耗费惊人，一座帝王陵就是一座宝库，有的帝王陵费尽国家几十年总税收的1/3以上（如汉武帝茂陵）。传统儒教社会其他人的丧葬耗费程度有异，但难改厚葬本质；上层群体的丧葬尤以奢侈浪费和民不聊生为代价。基督教社会的施舍、禁食、节制性欲和薄葬有助于节省财富用于救济贫弱。由于践行慈善不局限于奉献实物的施舍和捐赠，以“爱人如己”为指南的纯劳动服务也是慈善的一部分（如当前义工的志愿服务），所以任何组织和有行为能力的人都有机会成为慈善的行为主体。

中世纪教会与修道院拥有大量物质财富，尤其一度拥有天主教地区1/3以上的土地。土地主要来源于世俗捐赠；此外，教会与修道院也组织了大量垦荒和生产。由于教会力量和修道人员属于高度禁欲群体，并理应是全社会道德典范，且不可将财产转赠或遗传给亲属，所以教会掌握了可用于救济贫弱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厚物质基础。教会建立了大量慈善机构和其他免费公共服务机构，如养老院、救济院、育婴堂、图书馆等；还常为过往商人提供免费食宿，在实践层面彰显了爱和人文关怀，也奠定了现代慈善制度的基石（西方有提供免费公共服务的古老传统，但中世纪之前的古罗马城主要有免费浴室、剧场和面包房等）。

据历史资料，中世纪西方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传统中国，但其并未发生易子相食等重大饥荒下的悲剧事件。这种事件却在传统中国常常发生。重要原因之一是，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普世性的捐赠、施舍、禁食和教会慈善事业有助于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济贫弱。这也印证经济学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言（基于大量实证资料）：重大饥荒灾难不是因为食物短缺，其最根本原因是食物的不合理分配。

此外，基督教节欲伦理具有男女平等思想，有助于保护失身受辱的女性，并对确立现代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有重要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一方面，人类不可能根除，也不应根除物欲、性欲和统治欲。假如没有物欲和性欲，人类社会很快就会灭绝；没有政府权力主导的社会也会陷于混乱和失范状态。另一方面，古往今来，人类矛盾和冲突又多因物欲、性欲和统治欲而生。在当代中国，无论个人层面，还是社会组织层面，各色罪误也多可用物欲、性欲和统治欲作出有力解读。腐败问题尤可佐证此论。腐败多为物欲、性欲和统治欲的失节并发症，至少是在“三欲”之一存在突出问题。如何节制物欲、性欲和统治欲，并让其造福社会，是人类永久面临的重大课题。基督教节欲伦理及其践行历史则可为今天提供有益启示。

在物欲方面，基督教主张施舍、禁食和捐赠，力戒奢侈。在性欲方面，基督教主张独身、婚前童贞、婚内禁欲，严禁非生育目的性生活和非婚性生活，淫乱之行更受严惩。在统治欲方面，基督教主张用神权、教权和法律规约世俗统治。在传统基督教社会，宗教力量是践行节欲的典范，世俗权力同臣民一样要持守施舍、禁食和一夫一妻制等伦理规范。基督教强调神权和教权高于世俗权力，并主张以神法、自然法和人法规约权力，在中世纪时已初步将世俗权力关进笼子，

实现了对人权与自由的初步呵护。基督教节约伦理有助于救济贫弱,保护失身受辱妇女;对现代慈善制度和婚姻制度也有积极影响。但基督教最大特色是建构了保障节欲伦理执行力的有力机制,该机制包括经典文献的权威性、教义的合理性、经典作家的以身垂范、应然激励的可信性等因素。当然,不可否认,基督教节欲伦理也存在问题,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尘世生活的幸福,尤其限制了性福。

相比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现代社会对物欲和性欲的节制普遍宽松化,但对统治欲的规约普遍收紧(宗教节欲伦理、自由、民主、宪政等共同承担了此项重任)。借鉴基督教的节欲智慧,为当前社会各个阶层确立合理的欲望空间,杜绝奢侈并救济贫弱,以法律和伦理道德有力地规约权力,为节制欲望构建具有“完全信息、无限重复博弈和公正奖惩”特点的约束机制,是化解有限之物与无限之欲冲突的可选路径,有助于社会和谐。

(责任编辑:袁朝晖)

孙晶、朱明忠著《印度吠檀多哲学史》(上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上卷445千字,416页,定价78元;下卷310千字,288页,定价55元。

上卷为孙晶所著,除“序章”外,共分十章,“正统派哲学的思想起源:吠陀”、“正统派哲学的思想起源:奥义书”、“《薄伽梵歌》的哲学思想”、“吠檀多哲学的根本经典:《梵经》”、“乔荼波陀与《圣教论》”、“商羯罗的哲学思想”、“罗摩奴阍的限定不二论”、“摩陀婆的二元论”、“筏罗婆的哲学”、“16世纪不二一元论派的动向”。

下卷为朱明忠所著,除“绪论”外,共有三编:“第一编 近代吠檀多哲学”,有六章,“近代吠檀多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新吠檀多哲学的先驱者——罗姆莫罕·罗易”、“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吠檀多与自然神论”、“罗摩克里希那的吠檀多与‘人类宗教说’”、“新吠檀多理论的奠基人——斯瓦米·维韦卡南达”、“斯瓦米·阿贝德南达的‘万能吠檀多’”。“第二编 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吠檀多哲学”,有七章,“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斗争”、“提拉克的‘政治吠檀多’”、“甘地的哲学与吠檀多”、“奥罗宾多的‘整体吠檀多’与‘整体瑜伽’”、“诗人泰戈尔与吠檀多”、“薄伽万·达斯的‘关于自我的科学’”、“薄泰恰里耶的‘吠檀多认识论’”、“罗摩那·摩诃希的‘证悟自我’哲学”。“第三编 独立后的吠檀多哲学”,有七章,“独立后印度社会变革与意识形态斗争”、“拉达克希南的‘精神宗教’”、“斯瓦米·吉纳那南达的‘哲学的宗教’”、“拉哲的‘绝对唯心主义’”、“斯瓦米·兰伽纳塔南达的‘综合的永恒达摩’”、“马哈德万的‘吠檀多价值论’”、“新吠檀多哲学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印度吠檀多哲学从古到今的通史著作。